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九辑

中共无锡市、县委党史办公室
无锡市档案局编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九辑

· 内部发行 ·

中共无锡市、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无锡市档案局

一九八七年四月

封面设计 陶士范
本辑编辑 王向东
杜松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九辑

无锡市太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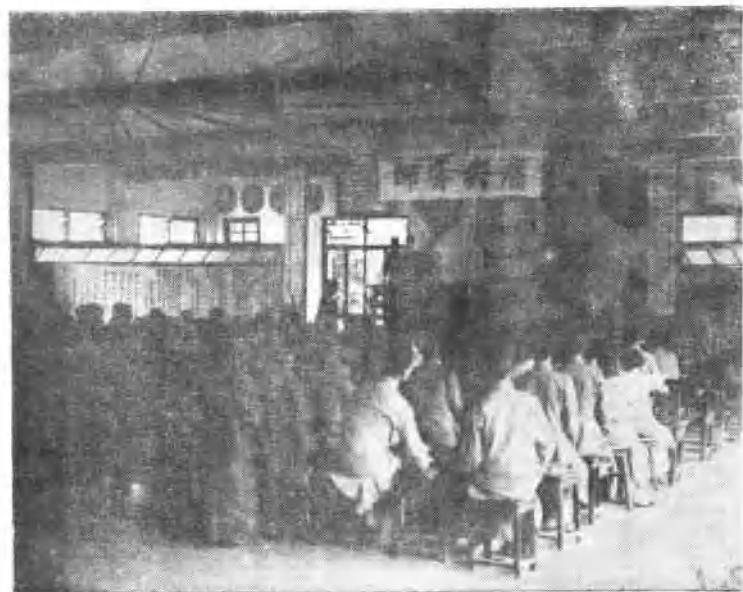
字数 100,000 印数 8,000

1987年4月印 工本费0.80元

无锡市内部期刊登记证第二十号

▼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无锡鲁迅先生追悼大会在锡师附小礼堂举行

◀ 张闻天在无锡太湖饭店





惠峻山烈士



吴道元烈士

目 录

·怀念张闻天·

- 抚今追昔忆父亲……………张虹生 (1)
- 回忆父亲二三事……………张维英 (6)
- 回忆闻天伯伯……………张昌麟 (10)
- 丹心献人民 豪气冲长空
- 忆晚年病中的舅舅……………马文彬 (14)
- “我是一个普通读者”
- 张闻天同志来无锡市图书馆借书追记…程光雄 (20)

·专题调查·

- 曙光文艺社及其所办的刊物……………陈钟英 (24)
- 一九四七年无锡城区“五五”抢米风潮……………陈伦军 (36)

·回忆录·

- 我参加无锡早期革命斗争的情况……………杨锡美 (46)
- 忆无锡各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孙翔凤 (55)
- 回忆无锡职业青年抗日救国会……………尤 旭 (60)
- 抗战初期斗山南麓的儿童团……………陆兴祥 朱仰增 (70)
- 忆创办《东进报》(地方版)始末……………林子平 (75)

太湖地区党报在艰苦斗争中发展

-洪海泉 范征夫 吴梅 田树凡 谈平东 (82)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严安区的秘党工作.....须士雄 (95)
在无锡创建地下新青团的经过.....叶 冰 郑锦春 (104)

·人物事略·

- 无锡早期革命理论传播者唐光明.....朱昱鹏 (112)
斧头吃凿子 凿子吃木头.....唐光明 (119)
十块钱 (小说).....唐光明 (120)
高文华书信选 (五封)..... (122)
惠峻山烈士传略.....童子明 许海泉 (129)
吴道元烈士传略.....荣宝甫 李广平 吴正光 (137)
忆吴道元烈士.....江 革 (144)

·小资料·

- 史海点滴 (一)..... (13)
史海点滴 (二)..... (58)
史海点滴 (三)..... (81)
史海点滴 (四)..... (94)
史海点滴 (五)..... (128)

抚今追昔忆父亲

张虹生

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家中写信要我回去帮助搬家。我特地请了事假由新疆赶到广东肇庆，一到家父亲张闻天就兴奋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六年的看管生活结束了，组织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养病，具体地址尚未最后确定。”这次我在家住了三个月，直至陪同父亲到无锡住进汤巷四十五号。

父亲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无论是在肇庆看管时还是在无锡养病，一般每天早上五点到五点半起床、洗漱；五点半到七点打扫庭院、散步和收听国内外新闻。我难得回家一次，在肇庆见他年逾七旬，又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高血压，还要自己打扫院子，就心痛地说：“爸爸您不能请警卫班的解放军同志帮助打扫打扫吗？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今后就别再扫了。”父亲听了我的话，苦笑着回答：“现在请人不容易，再说古人都知道各人自扫门前雪，我门前的树叶自己不打扫让谁来打扫呀！打扫院子还可以锻炼身体，岂不一举两得，生命在于运动嘛！”

上午七点半到十一点及下午二点到五点是父亲看书、读报、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伏案写作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全神贯注，有时打雷也很少知道。我的大女儿冬燕两岁时，有一次，抱着她爷爷的腿摇了半天，问爷爷为什么不理她时，父亲才如梦

初醒地答道：“啊！是小冬燕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爷爷在看书，没有听见。”接着祖孙俩吃点零食或给冬燕一支笔、一张纸，让她在旁边画画，然后他再继续看书或写作。

下午五点半吃晚饭。晚饭后散步聊天，逗孙女玩，同时也是量血压、看病的时间。九点半休息。

在探亲的日子里，父亲早、晚散步都要我陪同。他从刚出版的新书谈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无所不谈。身体好时，他还让我陪他去无锡市图书馆、新华书店、百货商店及学前街菜场等处转转，常和营业员、顾客、菜农等交谈，了解市场供求、价格等情况，体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当父亲听说有些干部“开后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居民们买菜要排长队等情况后，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过去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高的，可这几年……”老人叹息着没讲下去，随即把厨师傅黄关祥叫来，对他说：“今后不要再到招待所（市委供应点）去拿菜了，你每天到菜场去排排队，有什么就吃什么。”这以后，父亲跟我谈得最多的，一是党风问题；二是国家经济问题。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并不无感慨地说：“真想跟陈云同志好好谈谈经济问题啊！遗憾的是不能跟他交谈了。”

在谈到党风问题时，父亲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他多次明确表态“不要说我没有后门；就是有后门我也不开！”对于亲属中向别人托情送东西，他很生气，断然表示“就是办不成

事情，也不要搞那一套！”如果亲属中间任何想利用他一点关系说情的，只要一经发现，他立即制止。父亲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要我们切记，千万不要卷到这种歪风中去。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父亲生前一贯奉行的原则。从我记事起，无论是省委书记还是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他从未利用过手中的权力为我这个独生子谋过一次私利。一九五七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他鼓励我带头到河北茶淀农场劳动，一去就是两年，直到一九五九年农场撤消改为农技校，我才获准报考了大学。报考前，我请求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在录取时有所照顾。父亲不但不肯，反而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为避免我再次纠缠，在我临考前他和妈妈一起离开北京疗养去了，直到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回来。

一九六二年我又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我挖大渠、割麦子、拾棉花、喂牛、赶马车，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最低的工资（农工下延级31.08元），简陋的医疗条件，使我患上迁延性肝炎，久久未能痊愈。为此，我曾向父亲请求回北京治病。我想这次既不用他求情，又不要他开什么后门，为了治病，总可以通融了吧！谁知父亲回信却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里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的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父亲随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要我在

新疆安心养病，再适当增加点营养，争取早日痊愈……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鼓励帮助下，在新疆整整工作了十五年，直到老人家去世时，我还在那里，并在那里安了家，还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十五年中，我们父子俩见面的次数不多，联系全靠鸿雁，父爱和家教交融，字里行间蕴含了慈父对远方独子的思念和殷切期望。每当我想起这些谆谆教诲，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苦全然不在话下。可惜父亲这些珍贵的手迹在“文革”抄家时被焚烧殆尽。“四人帮”的肆虐延伸到遥远的边疆，我并没有因远离父母而逃过被株连的厄运。

父亲一生勤奋好学。他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音乐等，都有研究。他早期著的长篇小说《旅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他的书橱里收藏的大百科全书就有英、俄两种文版的。记得他当驻苏大使时，偶尔还带我去剧场听交响乐队的演奏，而且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剥夺了为人民工作的权利。他身居斗室，一遍又一遍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通过反复研究和推敲，融会贯通。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这六年中，在两眼矫正视力只有0.2情况下艰难地写下了十万余字的文章和笔记，总结了这场劫难的历史教训，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他深刻地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些关系和现存的各种矛盾，从经济、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来寻找产生的原因，力图从个别看到一般，从偶然看到必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坚持不懈地探求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的规律。他对党

的前途充满信心，希望有一天能在哪次会议上谈谈，以免我们党在今后工作中再走弯路。

爸爸多次请求党能够让他到城乡各地看看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渴望党能分配他做点具体工作，以便将他探求多年的治国兴邦良策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但这些愿望和要求直到他逝世都未能实现。我敬爱的爸爸是怀着对人民的歉意离开了人世的。

爸爸在弥留之际，盼望着能把我调近些，以便经常可以回家看望他（当时政策允许每家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故不算特殊要求）。他曾对唯一的媳妇蔚训交待：“你们调回来后工资要减很多，又有两个小孩，生活肯定有困难，你们不要向组织伸手，有困难由我来管，我会照顾你们过一般的生活。”又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给国家做事了，国家还给我那么多钱。我去世后，除留一小部分给儿子补贴生活费外，绝大部分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党，支援国家建设”。

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遗嘱，将父亲生前的四万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金钱和物质的遗产。但我明白这是父亲为弥补他被“四人帮”剥夺工作权利后，未能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最后一份心意。父亲坚强的党性，对真理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催我自新，促我奋进，这是最敬爱的爸爸留给我们全家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再前进！

回忆父亲二三事

张维英

父亲张闻天在无锡逝世已十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他温和、慈祥，充满父爱，令人难以忘怀。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想起失去了一个热爱自己，关心自己的亲人，不禁热泪盈眶、长夜难眠。

父亲是上海川沙人，很早就远离家门出去革命。他走时，我才三岁，妹妹引娣还未出生。不久，妹妹呱呱落地。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两人，靠种田为生。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生活极其困苦。父亲走后，杳无音讯。直到一九三三年，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父亲的消息。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十几万银洋悬赏父亲的头颅，全家得知后，惶恐而紧张。这消息给我们母女三人带来了新的灾难，我们不仅被人斥为“匪属”，而且还给当地反动政府抓进去过，受尽了折磨。

革命胜利后，一九四九年冬天，父亲写信回家，说要引娣到东北安东见面（父亲那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引娣，这位他从未见上一面的二女儿，这时已是二十六岁了。引娣与丈夫同去安东，但未见见面。那时父亲工作繁忙，已回北京准备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后因美国阻挠未到职）。两人再返北京，父女终于见面，后来，在父亲的关心下，引娣被送入呼兰工农干校学

习，一九五三年进外交部做打字员。父亲经常对引娣说：“要好好地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不分工作条件好坏、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就说烧饭，也很重要啊！如大家吃了夹生饭，就没有劲了”。他非常关心引娣的学习问题，多次说过：

“读书好，读书要自己争取，不要处处等待。”“不要老是在家里抱小孩，要勤奋学习。”一九五五年外交部精简机构，父亲带头动员二女儿回上海。引娣回上海后，进自行车厂仍做打字员。

父亲对我妹妹如此关心，对我同样是这样。他在一九五〇年时曾到过上海，帮我还了一些债务。因为解放前，我丈夫被抽壮丁，我借米借钱去赎他，负了一身债，因无力偿还，一直欠到解放。还因为我孩子多，生活困难，父亲将我的大女儿秀君接到北京去加以培养。

一九五九年后，风云变幻，庐山会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又一次离开了父亲。我们无从打听父亲的消息，不知他被流放在什么地方。父女一别就是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五年父亲由广东肇庆迁居无锡才又见到了面。在这年十一月份前后，我和引娣由大女儿秀君陪同去无锡。后来我断断续续在父亲家照顾他的生活。厨师黄关样在锡时我就回上海，他去北京家中时，我就到无锡。这段时间大约共有两个多月。我那时没有正式工作，就帮父亲做家务，每天起得很早，洗衣、烧饭、劈柴、揩窗、抱地、翻被子等样样干。我从来没有服侍过父亲，当时觉得能尽一个女儿的责任，心里是很愉快的。

父亲这年已有七十六岁了，高龄使人变得温和，我觉得他更慈祥可亲了。有一回，午饭后我在纳鞋底，父亲走过来劝我，

“不要纳了，你劳动了一辈子，休息休息吧！子女们的穿着让他们

去考虑。”父亲经常夸我“吃得来苦，样样肯干，人也勤劳、善良，不愧是劳动人民出身。”他还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过：“没有工作反而好，有了就要牵连到你了。”

父亲在无锡时，经常看书、写东西，有时还看上海地图，查找我住的阜新路和引娣住的四平路。他也爱看亲属们的信，一般的信要看好几次。秀君送给外公的一张合家照，他也反复看，他的内心蕴藏着对子女们的一片深情。我与引娣不断地感受到深切而真挚的父爱。

父亲对女儿充满了爱，对我的子女也充满了爱。有一回，父亲和秀君游玩蠡园。他指着长廊里的石刻问秀君：“能读通吗？”那上而刻的是古文，没有标点符号。他听秀君念得疙疙瘩瘩，就边念边解释。还说：“以后不要老看小说，要多看些理论书、历史书，这样才不致于人云亦云”。父亲对外孙们的读书要求，总是尽量满足。秀君在北京外公身边上小学时，每逢星期天，爷奶俩总陪着她到新华书店去买书，一买就是一大叠，有时一下子就买十多元。在这方面我父亲特别慷慨，期望着外孙们个个有知识，有才干，将来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的孩子们感到与外公在一起，会不知不觉地受到他好品质的感染。父亲早在一九二四年间于重庆女二师任教，后又在川东师范任教。秀君在为他整理这段简历时曾写“学校慕名而留任”等字样，父亲看后把“慕名”两字划去，体现了父亲谦逊的美德。这些细小的言行，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孙辈们的思想。

父亲对我大女儿秀君是这样关心，对我当时在安徽插队落户的三女儿凤君也十分怜爱。一九七六年三月，凤君从上海探亲后到无锡，去看望了她外公。凤君虽然有许多年没有见过外公了，

但那次见到外公却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与拘束。父亲曾托凤君在上海买过布，做过衣服，对凤君的裁缝手艺表示欣赏（那是她在插队期间学会的“副业”）。因此，凤君住在外公身边的一个星期里，主要是为老人家做一些衣服（准确地说是补补改改）。那次凤君为外公做了两条的确凉裤，还改了一条旧得发白的哔叽裤子。这条裤子还是他做外交部副部长时穿的。因为人瘦了，所以凤君将这条裤子改小了一圈。凤君做好后送到外公面前，他马上穿起来，显得非常高兴。可见我父亲一生简朴，在生活上是一个多么容易满足的人啊！我父亲对这个插队落户的外孙女十分关心，问她：“你到农村几年了？”凤君说：“有六七年了”。又问：“别人都回城了，你怎么还没有调上来？”答：“因为我没有路。”我父亲听后，良久不语。谁知，这一晚，他辗转翻侧整夜没有睡着。更令凤君温暖的是，外公跟她谈了选择朋友的标准。那年凤君已二十五岁了。外公对她说：“找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党员，要品德好，性格协调，人要长得高高大大的。至于相貌嘛，只要五官端正就行，不必太好看。漂亮的男人，注意的人多”。说到这里时，在坐的家人与无锡医生都笑了。

父亲在无锡期间，共给过我六七十元钱，作为我照顾他的酬劳。当时我以为，父亲的经济很困难，因此，拿时心里很过意不去。然而他过世后，得知他与刘英妈一下上交了八万元作为党费与儿童基金费，我心里非常吃惊。要知道他老夫妻俩要积出这么多钱是很不容易的。父亲将钱全部交公了，使我感到他爱党爱国、公而忘私的伟大胸怀，感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我在无锡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深深地体会到他是一位温和、慈祥的父亲。他留给我们许多的回忆。

回忆闻天伯伯

张 昌 麟

早在大革命时期，闻天伯伯就与我父亲张健尔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远离家乡，投身于革命洪流。一九五〇年，我到北京华北大学学习，伯伯来看望我，并告诉我父亲为革命牺牲的消息，教育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学习父亲的优秀品质，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以后，虽然我与伯伯相处的机会不多，但伯伯一直在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着我的成长。

一九七五年八月，伯伯由广东肇庆迁居无锡。一到无锡，他即写信给我。信中谈了简要情况，并叫我随时可以去看望。捧读来信，我想到又能和伯伯见面，心中十分激动。没几天，我就去无锡看望伯伯，住了三天。隔一周后，我又去伯伯那里。起初两次到锡，主要帮助伯伯整理由广东肇庆托运来的行李。伯伯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些旧家俱，但却有大量的书籍，其中有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迁家时，伯伯别的日用杂物都肯丢，唯独书籍不肯抛下，满满地装了几大箱。他十分珍惜这些跟随他转辗多年的书籍。

以后我每个月都要去无锡探望伯伯。在锡期间，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不倦的读书、写作和与我亲切地交谈。他习惯边看书、边做札记，在马列著作上写了大量的提示、笔记。伯伯对当